

英属印度与 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吕昭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英属印度与 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出品人：吴云
策划编辑：陈曦
责任编辑：石可
装帧设计：郑明娟



ISBN 978-7-5482-2526-3



9 787548 225263 >

定价：57.00元

英属印度与 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吕昭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 : 1774~1911 / 吕昭义著

.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526-3

I. ①英… II. ①吕… III. ①中印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774~1911 IV. ①D82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1128号

出品人: 吴 云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石 可

装帧设计: 郑明娟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 1774—1911

吕昭义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526-3

定 价: 57.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叩击天朝“后门”	(14)
重商主义与天朝主义的冲突	(14)
“寻找新的猎获物”	(19)
博格尔的札什伦布之行	(22)
哈斯丁斯的曲线计划	(29)
迂回路线的中止	(31)
第二章 藩篱与跳板	(37)
两种国际体系	(37)
尼泊尔	(43)
缅甸、阿萨姆	(48)
拉达克	(53)
锡 金	(60)
不 丹	(64)
第三章 贯通滇缅	(70)
对华贸易的辩论与滇缅路	(70)
斯来登腾冲之行	(78)
马嘉理事件与《烟台条约》	(84)
第四章 贯通藏印	(97)
印度茶业的勃兴	(97)
“商业先驱”	(101)
探险家与“学者”	(105)
马科蕾通商使团	(109)

第五章 贸易跟着国旗走	(114)
“葛洪铁路计划”与“柚木案”	(114)
奇怪的谈判——中英缅甸问题谈判	(117)
隆吐	(124)
奇怪的战争	(128)
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条约	(131)
亚东开关	(137)
第六章 卷入帝国主义全球争夺中的中国西南边疆	(142)
俄法的“钳形攻势”与“南北夹击”	(142)
俄法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	(155)
那个要“兼并活佛”的总督	(158)
第七章 “缓冲国”计划	(166)
“缓冲国”计划的出笼	(166)
为了战争的谈判	(181)
第八章 拉萨劫盟	(198)
古鲁屠杀	(198)
江孜血战	(209)
拉萨劫盟	(217)
第九章 从《北京条约》到《加尔各答章程》	(225)
中英关于修改《拉萨条约》的谈判	(225)
英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235)
加尔各答通商章程	(239)
第十章 战略边界	(246)
中国与印度的觉醒	(246)
“战略边界”	(258)
片马	(273)
参考文献	(278)
再版后记	(281)

绪 论

一般把 1757 年的普拉西战役作为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开始，在这以后英国通过武力扩张，将其统治和控制扩大到南亚次大陆、缅甸。英属印度的广大地区，囊括了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缅甸。与英属印度接壤的中国西南地区即现在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的正式接触起自 1774 年博格尔的日喀则之行，本书以此为起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也有了重大的改变，故将此作为本书的结尾。至于从辛亥革命到英国撤离印度的时期，拟日后再写续编。

英国入主南亚次大陆和缅甸，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性质，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性质。

在英国人之前就有众多的异族入侵者进入印度，他们几乎从同样的方向涌入次大陆，或割据一方，或建立帝国。可以说，印度的古代、中世纪政治史就是一部异族入侵史。然而，印度以其神秘的宗教、深邃的哲学、古老的村社制度而历尽沧桑，不为政治军事的风暴所动摇。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的规律，入侵的异族总是融合于印度社会和文明，他们所建立的王朝最终都变成了印度的王朝，统治者以印度为家，不管他们代表什么样的阶级，他们的内政、外交均是以在印度建立的国家的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历史上中国与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与缅甸有朝贡关系，这些关系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双方均根据各自国家的利益来处理国家的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交往不带有破坏各自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存在把一种制度强加于另一种制度之上的情况。

英国人是最后一个入主印度的异族征服者，他们与以往的入侵者大不相同，他们一直保持着“外国性”，从未融入印度社会，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不是

属于印度的，而是英属印度。^① 英属印度的对外政策不是由当地印度当局根据印度的利益来决定的，而是由远隔重洋的英伦三岛上的当权者来决定的。英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这个“世界”也就是以英国为工业和财富的中心、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以伦敦为霸主、以东方为其附属的世界殖民主义统治体系。不言而喻，这就意味着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基础，施行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进行暴力征服和经济掠夺。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正是为这个总目标服务的。

具体而言，在上述 137 年间，英国和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出自其三项基本利益：获取原料、倾销商品的商业利益；争夺霸权的全球性军事战略利益；维护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地区性政治军事利益。三者互相联系，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据此，可以把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兹分述如下：

1774 至 1894 年为商业扩张时期，以打开中国的后门为主旨，提出贯通滇缅、贯通藏印的对华贸易战略。通过军事的、外交的手段，强加不平等条约，达到其目的。

商业利益是把英属印度引向中国西南边疆的基本的也是原初的动力。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对华贸易上升，与清王朝的矛盾也日渐突出。矛盾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性与传统经济的保守性的冲突，同时也是英国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与清王朝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斗争，也有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引起的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冲突。此外，英国在中国东南沿海还处于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的竞争之中，不能独专对华贸易的利益。英商力图突破海禁，扩大对华贸易，但遭到清王朝顽强的抵制，洪任辉事件以清王朝惩罚英商无视中国海禁强行通商而告终。为了绕过清王朝的海禁，避开西、葡、法的竞争，开辟英国产品的市场，东印度公司在东南沿海碰壁，于 1768 年指示孟加拉总督寻求一条绕道中国西南边疆的商路，英属孟加拉当局在 1770 年孟加拉大灾之后急于寻找“新的猎获物”。

① 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特点，参看程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一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55 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斯丁斯借班禅调解英属印度与不丹冲突之机，派遣博格勒出使札什伦布，后来又派遣忒涅出使。这两次出使都以失败告终。此后，英属印度发动战争，征服和控制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周边各国，进逼中国西南边疆。

在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并以武力打开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后，英属印度不仅没有放弃迂回中国西南边疆的行动，反而更加迫不及待地加以推行。这是因为，第一，英国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英国的工业品尚不能一下子就轰开中国自然经济的壁垒，英国对华贸易并不如英商所期望的那样发展；第二，中国东南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蜂拥而入，纷纷要求利益均沾，近现代工业在欧洲北美的兴起及全球交通通信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列强在华的商业竞争大大加剧。而在这时，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和下缅甸的征服，中国周边的属国也逐步地被英属印度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在印度瓦解了封建经济，建立起了附属于英国的工业、种植业、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印度茶业的兴起和铁路干线的铺设，这就为英属印度提供了可以灌销西藏的廉价印茶（与川茶在西藏的售价相比）和跨越天然屏障大规模运输商品的物质力量。面对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英国需要确立一个利用英国的有利条件来争夺和控制中国市场的商业战略思想。

于是，在英国政府与英国商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对华贸易的辩论。争论的实质问题是要不要再使用武力把中国变成又一个印度。英国商人主张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用政治强权来创造英国产品市场，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政府认为其力量不足以承担征服统治中国的任务，主张依靠清王朝以“渐进”的方式全面打开中国市场。斯普莱提出的修筑一条从仰光到云南思茅（今普洱）的铁路的设想，把辩论双方注意力引向打开中国西南后门的方向，中国西南边疆被纳入了英国对华贸易战略的思考之中。经过辩论，形成了贯通滇缅、贯通藏印，连接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经由一条英国独擅其利的道路，建立英国在华优势地位，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争夺中国市场的商业战略设想。

在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认为开放中国沿海沿江的计划大体完成，便开始了打开中国西南边疆的行动。英属印度经过初步勘测，决定先打开八莫路线。斯来登前往腾冲与云南杜文秀起义军建立贸易关系，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英属印度又采取压迫清王朝的手段。英属印度武装人员强行入境导致了马嘉理事件，在威妥玛威逼下，订立了《烟台条约》。该

条约规定中英会商滇缅通商事宜，开放大理，英印派员赴滇；增开宜昌、温州、芜湖等口岸。另议专条又规定英国得派员游历西藏。英国的意图显然是一方面由东向西逆长江而上，另一面又由西南向东北从缅甸进入云南，两路在长江上游汇合，同时由印度进入西藏，从而实现贯通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设想。在此以后，英属印度决意打开西藏门户，为此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强迫清王朝与之订立了两个不平等条约，亚东开关，英国的商业触角伸进了世界屋脊。

第二个时期以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为主。1894 年以后，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英国和英属印度重新考虑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帝国主义国家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最终要由实力较量来解决，而实力较量的最高形式就是军事斗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放弃了商业利益，而是说它需要以军事手段来维护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从全球战略利益的高度来处理局部的商业利益。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英国在亚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它与俄法的争夺加剧，多次濒临战争边缘，俄国侵占帕米尔，进逼印度西北，法国西进暹罗，进逼英属缅甸，俄法联盟对英属印度构成“钳形攻势”；另一方面，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割东北，租旅大，谋图直隶，法国则占广州湾，划两广、云南为势力范围，英国宣布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形成了俄法联盟“南北夹击”英国在华势力范围的态势。

英国要对付的不仅是俄法，而且有后起的德国。在南非，德国怂恿德兰士瓦抗英人；在西亚，谋划延长柏林—拜占庭铁路至被英国视为“必须无可争辩地置于英国霸权范围内的”巴格达。尤其是德国扩充海军军备，叫嚣重新瓜分世界，对英国威胁更为严重。

面对错综复杂、危机四伏、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英国有两种选择，一是以俄国为主敌，在亚洲展开决战，如果这样，连接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素有“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之称的西藏，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英国势所必争。一是在亚洲收缩，集中力量与德国在欧洲决战，如果这样，就需要与俄法结盟，调解在东方的矛盾，西藏就成为英国为了与俄国缓和关系而可以抛出的“政治棋盘上的小卒子”。不论怎样，中国西南边疆都被纳入了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全球战略构想之中。

英国内阁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对其外交政策进行的调整，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与俄法结盟。

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坚持第一种选择，以俄国为主敌，在亚洲与之决战，把印度推上“国际政治的前线”“英帝国的战略前线”。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他提出了把西藏变为在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国”计划，谋求占据西藏，实现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英国势力范围的结合，以此击破俄法的“钳形攻势”和“南北夹击”，并以印度为基地，四面出击，掌握亚洲霸权。为此，寇松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违背英国内阁指示，以阴谋手段搞了一个非法的《拉萨条约》。

英国在自由党组阁后，加快了与俄国调整关系的步伐。为此首先与中国中央政府达成《北京条约》，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排除了寇松的“缓冲国”政治阴谋给英国调整外交战略所带来的障碍，随后又通过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和中英《西藏通商章程》，从而确定了西藏作为在中国主权之下的英俄间隔离地带的地位。以西藏问题为起点，英俄调整了它们在阿富汗、波斯利益，英法俄结成针对德国的军事集团。

1907年英俄协议的达成，标志着英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完成，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也随之转变，以维护其在英属印度殖民统治的地区性政治军事利益为侧重点。在英法俄结盟以后，英国与俄国的关系由争夺为主转变为联合为主，英国实施从亚洲收缩、加紧欧洲备战的计划。但是，以反对分裂孟加拉的斗争为起点，印度民族运动迅猛发展，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而在此时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向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传播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精神。中印两国的革命者互相同情，互为声援。印度人民反对分裂孟加拉的斗争就是在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运动启发下，以发动抵制英货为起点而发展成大规模反英斗争的。中国在川滇边界及西藏进行的“新政”焕发出了民族精神，向周边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发出了联合反对外来侵略的号召。如何在英国实施从亚洲收缩的局面下维持它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对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控制，是英国和英属印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英国和英属印度渲染“中国威胁”，“前进政策派”将其扩张的矛头从西北边境转向了东北边境，试图通过扩张构筑起一道把印度人民反英斗争封闭起来的“防火墙”。1910年10月，明托总督在他行将卸任时提出了建立“战略边界”的设想，向英国政府提议将英属印度的边界从喜马拉雅山脚推进到山脊。哈定继任总督后，经过短暂的犹豫，倒向“前进政策派”一边，采纳了明托的提议。威廉森非法越过“外线”到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活动，被阿

波尔人杀死。英属印度以此为托辞，组织了对阿波尔、米里人、密西米人的远征队，着手进行建立“战略边界”的活动。远征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上述部落地区进行勘测，为确定“战略边界”的准确走向提供情报，并在那些对所拟定的战略边界线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设立界标；将部落民置于英属印度“松散的政治控制”之下。在1911年至1912年的冬季，3支远征队分别窜入中国的门隅、珞渝、察隅地区，除对阿波尔人进行军事讨伐外，还搜集情报，勘测地形，在个别地方建立界标。根据这次考察的结果，英属印度修订了“战略边界”的具体走向，将达旺地区划在“战略边界”以南；在察隅方向，提出边界线应在瓦弄以北跨过洛希特河。

英属印度所要建立的“战略边界”还延伸至中国与缅甸边界。1911年1月，英属印度派军队远征，占领片马各寨，制造了片马事件。

综上所述，英国和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一切政策，无论是基于维护其商业利益还是基于全球战略利益和维护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利益，都是以英帝国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祸害，同时，毫无疑义，也损害了印度人民的利益。

经过印度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英国从印度撤离，英属印度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英国为维护其在印度的殖民地统治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建立“战略边界”，终归是机关算尽，徒劳无益。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由衷地钦佩，对于印度人民迫使英帝国主义撤离，从而使自己的西南边疆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抱有感激之情。然而，应当看到，英帝国主义虽然走了，但是他们造下的种种恶果并未如影之随形那样消失。这里着重谈谈两个问题。

（一）寇松的“缓冲国”阴谋以及所谓的“西藏独立论”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英国及英属印度在对中国西藏边疆采取第一个行动之时，就接触到了这一客观事实。博格尔和忒涅打算绕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通商，但是，班禅和拉萨派来的西藏地方官员正告他，西藏是中国皇帝的属土，无权与外国缔约，不经皇帝允许，外国人不得进入西藏。在客观事实面前，英国和英属印度不得不承认，要打开中国西南边疆的后门，首先得敲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想绕过中国的主权，走相反的道路，只会吃闭门羹。在此以后

英国和英属印度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来交涉中国西南边疆问题，如关于拉达克界址问题、《烟台条约》及关于游历西藏的另议专条、《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西藏通商章程》。英国政府自己也公开声明这些交涉表明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所谓“西藏独立论”源自寇松的“缓冲国”阴谋。

如前所述，把西藏变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是寇松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寇松要改变西藏的地位使之成为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国”，就必然要排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01年6月11日，寇松在建立“缓冲国”的计划中攻击说：“她（按，指中国）的宗主权只是一个闹剧，只被用来作为障碍”，须予排除，建立英藏联系。^① 1903年1月8日，寇松向英国内阁提出派遣武装使团入藏实施其建立“缓冲国”的计划，他把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名义上的宗主权”，英国政府只是把“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作一种宪法上的虚构和政治上的偏好来予以承认”，要求改变以往的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立场，实施其西藏政策。^②

英国内阁的全球战略与寇松正相反，为了缓和与俄法的矛盾，决定在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亚洲问题上与俄国达成妥协，不同意寇松的“缓冲国”计划。在答复寇松1903年1月8日信件的指示中明确肯定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寇松的“缓冲国”方针“侵犯中华帝国的完整”，内阁不能批准。^③

寇松违背内阁指示，阴谋推行其“缓冲国”计划，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搞了一个非法的《拉萨条约》，将其排除中国主权、改变西藏地位使之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的阴谋包藏于条约的行文中。但《拉萨条约》未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不过是一纸空文。

与“西藏独立论”互为表里的还有所谓“宗主权论”和“西藏自治论”。在寇松以前，英属印度和英国对中国与西藏关系的用词并不统一，有时使用“主权”，有时用“宗主权”，但不论怎样，英国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用词的实际含义是“主权”，在这点

① 《汉密尔顿信函》（Hamilton Papers），寇松致汉密尔顿，1901年6月11日。

② 《汉密尔顿信函》，寇松致汉密尔顿，1903年1月8日。

③ 《汉密尔顿信函》，汉密尔顿致寇松，1903年2月27日。

上并无歧义。在加尔各答中英谈判修订《拉萨条约》时，寇松、费利夏强制中国接受“宗主权”的提法，中方代表唐绍仪坚持主权，双方展开争辩。这时，寇松、费利夏所谓的“宗主权”已不再包含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包藏着分裂中国、分裂西藏的阴谋。寇松、费利夏宣称西藏是一个“自治国家，自己管理行政，自己征收赋税，自行与邻国缔结条约”。

寇松、费利夏等人在加尔各答谈判桌上妄图把“宗主权”的提法强加给中国的目的，是要给非法的《拉萨条约》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便在后藏继续推行“缓冲国”的阴谋。荣赫鹏远征军兵临拉萨时，达赖出走，寇松利用达赖建立“缓冲国”的计划落空，遂把阴谋活动的重点转向札什伦布。英国驻江孜商务专员欧格讷、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等人拉拢、威逼班禅，武装挟持班禅赴印，强制班禅接受英国保护，谋图宣布后藏“独立”，在后藏建立“缓冲国”。欧格讷在其计划中说他所进行的这一切活动“都可以在不公开触犯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之下进行”^①。这道破了寇松、费利夏等人坚持“宗主权”的险恶用心之所在。

但是，寇松的“缓冲国”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中英谈判从加尔各答移到北京，达成《北京条约》，《拉萨条约》作为附约，但在正约中做了重要的修正。在正约中，英国承诺不占并、不干涉西藏，中国保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西藏一切内治。这样，条约虽未明文写上“主权”，但已在条约的行文中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英俄关于西藏的协议中，英俄出于它们各自的目的，虽然写上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协议还规定英国驻西藏商埠官员得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并未参加谈判，这些规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又规定英俄不向拉萨派代表，只通过中国政府同西藏进行交往，这又表明对中国主权事实上的承认。在中英谈判藏印通商章程时，张荫棠排除英方代表戴诺顽固坚持的英藏直接交涉，经过力争，章程第四条关于商埠的交涉规定：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官员督饬藏官管理，英国商务官与品级相当的地方官交涉，商务官与地方官不能解决之事，最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核办。这样，英俄协议中的直接交涉也排除了。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Archives), 535-537, 欧格讷致怀特, 1905年11月23日。

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僧俗大众反对英国和英属印度吞并西藏分裂祖国，班禅被挟持到印度，坚持民族大义，不为英人费利夏利诱所动摇，拒绝英人的“保护”，欧格讷等人未能得逞。这样，寇松的“缓冲国”阴谋最终破产，所谓“西藏独立论”作为“缓冲国”阴谋的附属产物也随之成为历史的沉渣。

（二）“前进政策派”与“中国威胁论”

英属印度是英国王冠上的耀眼的宝珠，是英帝国亚洲霸权的支柱，但它就如希腊神话中无敌巨人阿克里斯的“脚踵”一样，是英帝国全球战略中最薄弱的一环。1902年英国国防部的一份秘密文件阐述英属印度在英帝国战略中的地位时说：“坦率地说，只要海军完成其任务，对于大陆国家的强大的地面部队来说，英帝国是牢不可破的，但在有一处是例外，即印度。”“只有在这里可以给我们致命的一击。通过征服使我们丧失印度将给我们的繁荣、威望及势力以致命的打击。敌对势力哪怕是接近它，带来的恶果也是不可估价的。”^①

英属印度应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在英国和英属印度内部一直存在着“前进政策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争论。

《剑桥英国外交史》评述“前进政策派”和温和派说：“印度的政治家们，尽管在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是都一致同意（印度的）西北边境是帝国的最大忧虑所在，而位居两大竞争势力间的阿富汗是不完善的防御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自坎宁以来的印度总督们吸取了1838—1842年的惨痛教训，坚持实行不干预阿富汗的政策，认为积极的干涉极为有害，只有在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时才可采用。与这种思想相对立的是前进派，这一派主要反映军界的思想，他们希望伺机而动，期待着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发生，一旦时机来临，就以结盟、派遣使团，或者在必要时提供金钱和军事物资等方式，把边境上所有统治者、酋长纳入不列颠政府。”^②

这一评论指出两派军事思想起源于印度西北边境的防务，强调阿富汗问

① 英国国防部秘密文件：《在与法俄战争中的帝国军事需要》，转引自格雷夫斯：《波斯与印度的防务》（R. L. Greaves: Persia and the Defence of India, 1884—1892. London, 1959），第192页。

② 瓦尔德、古奇：《剑桥英国外交史：1787—1919年》，第3卷，纽约，1923年，第72页。